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编者按:《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重要文化工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突出价值。经过学界同仁的努力，四库学研究取得了众多进展，成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支撑。本期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论文，以《三国志》等四个提要的稿本、阁本、定本的比较，再次确认学界四库提要“两个文本系统”之说，并通过各提要核心内容的比较发掘四库提要后隐藏的不同思想指向，为四库学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两个文本体系，两种思想指向

——以《三国志》等四种提要的比较为切入点

周积明

[摘要] 四库提要的稿本、阁本、定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学界一般认为，这些差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四库全书》经过了撤换、增补等过程，四库提要反复改动，其间又有馆臣擅改，誊录监生删节、疏忽以及纪晓岚“笔削一贯”等因素掺入。但是，除以上因素外，四库提要的阁本和定本很可能是基于不同源文本而进行修改。正是从不同源文本出发，《三国志》《盱江集》《文章正宗》《古今纪要》四部著作的提要形成两个文本系统。一个是以文渊阁本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为主体，一个是以文溯阁本提要、文津阁本提要为主体。两个文本系统不仅文字不同，思想指向也有一定差异。

[关键词] 四库提要　文本系统　思想指向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6－001－014

一、引论：刘浦江、许超杰等学者对四库提要比较研究的启示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库学的重大创获之一就是《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

[收稿日期] 2024-05-06
[作者简介] 周积明（1949—　），男，湖北大学教授兼湖北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 430062，1405304691@qq. com

汇编》《文溯阁四库总目提要》的出版，更有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简称“上图稿本”）、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藏稿本（简称“国博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简称“国图稿本”）、天津图书馆藏残稿（简称“天图稿本”）、台北图书馆藏残稿（简称“台图稿本”）等四库提要稿本、抄本的发掘和问世，形成四库提要的稿本系统、阁本系统与定本系统，[①] 为四库提要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四库提要比较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四库提要从四库采进书目到四库馆臣最初撰写的分纂稿到阁本提要以及最后形成《四库全书总目》，经过了多重修改、撤换、增补、复校等过程，内容、文字、体例等都有不少变化，存在许多差异。对这些差异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的复杂性。

对于四库提要的差异进行比较，早在民国时期已有学者注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黄爱平、司马朝军、段文瑄等学者亦有重要贡献，但是，刘浦江却敏锐地发现以往的四库提要比较研究存在缺失。他撰文指出：“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总目》提要与若干分纂稿或书前提要之间的异同进行过研究，但多局限于文本内容的比较分析，而很少与四库学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因此往往只能看到各个文本之间的表面差异，而无法了解其背后复杂的衍变过程。”[②]

许超杰高度同意刘浦江的意见，他比照《孝经大义》《孝经注疏》《周易旁注前图》《革除遗事》不同提要文本，发现“其中明显具有两大文本系统”。以《孝经大义》为例，其文本系统 A：《初次进呈存目》（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前）—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文津阁本（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文本系统 B：文渊阁本（乾隆四十年五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前）—《四库全书总目》（乾隆六十年正式刊行）。由此，得出结论说：《四库全书》提要文本之间巨大的差异并非是流传、修订产生，而是由于提要稿依据底本不同所致。不同的源文本产生了不同的提要文本系统。[③]

2013 年，赵喜娟通过细密的校读，指出：“总体上说，文渊阁本与《总目》较接近，文津阁本与文溯阁本相近，且文渊阁本与《总目》较详尽，文津阁本与文溯阁本较简略。文津阁本与文溯阁本应该更接近提要的原始面貌，而《进呈存目》《分纂稿》为提要的最初形式，自然与文津阁本、文溯阁本更近。《荟要》没有明确的倾向，有的与文渊阁本一致，有的与文津阁本一致，有的与其他版本都不一样。”[④] 她的结论与许超杰近似，即四库提要存在 A、B 两个文本系统：A 系统为《进呈存目》《分纂稿》与文津阁本、文溯阁本；B 系统是文渊阁本与《四库全书总目》。

笔者此前已在《三国志》的四库提要中发现两条文本脉络与诠释脉络，但始终无法从线性的时间修订上来解释其间的差异。[⑤] 许超杰的“文本系统说”以及赵喜娟的研究使笔者以往的疑点得到冰释。本文由许超杰、赵喜娟之论更进一步，以《三国志》等四个提要的稿本、阁本、定本的比较，支撑许超杰的四库提要“两个文本系统”之说，并通过各提要核心内容的比较，发掘四库提要不同文本系统后隐藏的不同思想指向。

---

① 何宗美、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28 页。

② 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 年第 5 期。

③ 许超杰：《〈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文献》2020 年第 6 期。

④ 赵喜娟：《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考校——以集部别集类 (汉魏至宋代中期) 为例》，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82 页。

⑤ 周积明：《从道德批评到历史认识——宋至清关于三国正统书写者的评论转向》，《史学月刊》2023 年第 10 期。

二、《三国志》提要的比较研究

《三国志》，作者陈寿。其提要目前可见于《四库全书荟要》、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六种文本。比读六种文本中关于陈寿的评价，其间差异明显，界限分明。

（一）《三国志》提要关于陈寿评说的同异

《四库全书荟要》本"恭校上"于乾隆四十年十月，是目前可见各《三国志》提要中最早的版本，其中关于陈寿评价如下："寿以晋承魏统，故不以统与蜀，其识逊于习凿齿。然其书简质，或谓胜于蔚宗。"①

文溯阁本与文津阁本提要分别"恭校上"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与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两阁提要关于陈寿评价同于《四库全书荟要》本，唯将"寿以晋承魏统"一句改为"寿以晋得国于魏"。②

如上三提要不仅关于陈寿的评价一脉相承，而且在评述裴松之注时都引用了乾隆帝的御制诗："伏诵御制诗有云'无识注之者，复值裴松之。'万古定论，足破群言矣。"

但是，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本和《四库全书总目》本的《三国志》提要关于陈寿的评述却全然不同。文渊阁本"恭校上"于乾隆四十一年九月，远在文溯阁、文津阁之前，其提要论及《三国志》时称："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③《四库全书总目》本作同样文字。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本的文字简明，却也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总目》本意蕴相通："寿不以正统予蜀，为后儒之论端。然晋承魏祚，寿为晋臣，伪魏是伪晋也，未免于不论其世。"④

《四库全书总目》本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本的《三国志》提要均未标示最后完成时间，只能以刊行时间来判断。《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刊行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前。《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与四十七年七月两次进呈御览，此后屡经馆臣修改，最终于六十年交由武英殿刊刻后庋藏各阁，故只能以最后刊行时间为依据。

文渊阁本和《四库全书总目》本的《三国志》提要不仅在分析陈寿"不以正统予蜀"的原因时文字完全一致，而且在评述裴松之注的文字中，均未引述乾隆帝的御制诗。如果诸阁本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本与《四库全书荟要》本依据的是同一底本，可以断言，撰写文渊阁本和《四库全书总目》本提要的四库馆臣断然不敢删去底本中乾隆帝的御制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许超杰所说的"一则提要可能具有多种提要稿，即不同的源文本"。

如上《三国志》提要文本的差异，正有力地佐证了许超杰提出的"两个文本系统"之说：其文本系统 A：四库全书总目荟要（乾隆四十年十月）——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七年四月）——

---

① 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25 页。

② 金毓黼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第 2 册，中华书局，2014 年，第 878 页；《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上），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285 页。

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54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0−12 页。

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82 页。

文津阁本（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文本系统 B：文渊阁本（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前）——《四库全书总目》（乾隆六十年正式刊行）。然而，笔者更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文本系统在文字上的差异，实蕴含着不同的思想指向，必须加以进一步讨论。

（二）《三国志》提要不同文本系统的思想指向

《三国志》提要的 A 系统，即从《四库全书荟要》到文溯阁《四库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将陈寿在《三国志》中的“帝魏”归因于“其识”逊于“尊蜀”的习凿齿，并非发之于偶然，追踪起来，这一评价实际上是远承“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的道德主义史学批评潮流，近承乾隆帝的陈寿评价。

三国正统的争论是中国古代正统论中的焦点之一。从西晋到南宋，孰为三国时期正统，在主流观点上经历了由《三国志》“以魏为居正”，到《汉晋春秋》以晋承汉，“以魏为伪国”，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把曹魏纳入汉以降的正统王朝体系，再到《资治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三国正统之归属在“尊魏抑蜀”与“正蜀伪魏”之间反复摇摆。直到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出，尊刘反曹之正统观深入人心，方为《三国志》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画上句号。

“自朱元晦沿习凿齿之论，正陈承祚帝魏之失，儒者相沿讥议承祚，日以加多。”①“讥议”的思想武器就是朱子在《资治通鉴纲目》中申明的纲常伦理大义。陈寿因此被称为“阿贼党逆，擅更正统”。②“悖古乱常，小人之尤。”③“史家谬戾，至此极矣！”④“其所著伪史，于法决当黜。”⑤“其间不无泰甚失平。”⑥

在三国正统观上，乾隆帝承袭朱熹以来的观念，尊汉伪魏。在《全韵诗·汉昭烈》中，他自注曰：“朱子《纲目》取《春秋》之义，以昭烈承献帝后，绍汉遗统，乃天下万世公论。”⑦在《御题郝经〈续后汉书〉》一诗的自注中，他一方面称赞郝经“久羁宋地，仗节不屈”，与苏武在匈奴娶妻生子，“不可同日语”，更肯定郝经的《续后汉书》：“陈寿《三国志》帝魏寇蜀，论者非之。然司马光作《通鉴》尚不能订其误，至朱子作《纲目》始为改定。经所著《续后汉书》独以蜀汉绍炎刘正统，其识甚正。”对比陈寿与郝经，乾隆帝称：“陈寿宁称史笔人，续之尊汉见诚醇。”更以“学术忠诚孰可齐”一语作为郝经之定评。⑧在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谕中，乾隆帝更直斥曰：“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⑨

无论是贬斥陈寿为小人、鬼魅还是指责他“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都把《三国志》的“帝魏抑蜀”视为一种悖反纲常伦理、违背史家精神的道德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识见低下”的表现。这样一种思维路线，正是朱子以来泛道德主义思潮的产物。

但是，在《三国志》提要 B 文本系统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却迥然不同。文渊阁书前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同样持“正蜀伪魏”的三国正统观，但却不是对陈寿简单地加以道德谴责和识见低下的贬斥，而是从“时”与“势”两方面来解读包括陈寿在内的三国正统论者正统观不同的原因，指出陈寿与习凿齿之所以所奉正朔不同，是因为西晋和东晋的政治格局政治脉络不同，在不同的“时”与“势”下，陈寿与习凿齿，北宋诸儒与南宋

---

① 刘咸炘：《〈三国志〉知意·总论》，《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一，第 313 页。

② 王图：《季汉书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30 册，齐鲁书社，1996 年，第 4–6 页。

③ 赵作羹：《季汉纪缘起》，《清代稿本百种汇刊》第 23 册，文海出版社，1974 年，第 2、15 页。

④ 叶向高：《季汉书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30 册，齐鲁书社，1996 年，第 2 页。

⑤ 王图：《季汉书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30 册，第 6 页。

⑥ 刘咸炘：《〈三国志〉知意·总论》，《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一，第 313 页 .

⑦ 《御制诗四集》卷 49，《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2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603 页。

⑧ 《御题郝经〈续后汉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85 册，第 1–2 页。

⑨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第 3 页。

诸儒，必然发出不同的声音，表达不同的话语，如果互换置身时空，他们的三国正统论必将不同。因此，陈寿尊魏和习凿齿尊蜀，绝不是识见高低的问题，而是“时势”的作用。文渊阁书前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由此作出精彩论断：“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批评非议陈寿的后儒“未免于不论其世”，也正是基于同一立场。所谓“论其世”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在具体历史环境和时势下讨论问题，而不能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加以衡量。这样一种认识，在欧洲历史主义中多有阐述，如赫尔德强调：“我们必须留意个人的和时代的背景，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① 要“看清楚它们各自不同的相貌”，要“进入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它全部的历史”，要“着眼于这个人的当下环境，这个环境传递给他一定的主题、技巧和态度”。② 歌德以诗一般的语言宣告传统历史主义的哲学基础：“我可曾告诉你这个词语，‘个体是无限的’？从中，我推演出了整个世界。” ③ 梅尼克因此总结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的观察”。④ 而文渊阁书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当论其世”之说，正体现了“个体化观察”和“个体化历史”的理性历史主义意识。

三、《盱江集》提要的比较

《盱江集》，作者北宋李觏。其提要现可见于《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姚鼐分纂稿、《四库全书初次进呈书目》⑤、《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与《四库全书总目》本八种。有足够的样本意义。

（一）《盱江集》提要中关于李觏评论的比较

在撰写时间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无疑最早。其提要曰：“李盱江集三十七卷外集二卷。右宋太学说书，权同勾管太学，南城李觏撰。门人陈次公墓志云：先生其实如秋，其受如海。外示发舒，中以直正。又嘉祐三年诏云，尔醇明茂美，通于经术。东南士人推以为冠。弟子著录千余人，今集后有门人录一卷，纪有三十八人之本末，大略附焉。” ⑥

姚鼐作为分纂官撰写的《李盱江集》提要曰：

> 李觏字泰伯，建昌南城人。载《宋史·儒林传》，集内年谱一卷，诗文三十七卷，诰辞及他人为作诗文三卷，合四十一卷。朱子谓，泰伯文实有得于经，能自大处起论。陈振孙云：“泰伯不喜《孟子》，作《常语》专辨之。”今按，觏《常语》内惟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及《伊尹废太甲》、《周公封鲁》，此三者与《孟子》不合耳，其余文中引用《孟子》之处甚多。《答李觏书》云：“孟子、荀、杨醇疵之说，不可复轻重。”是觏未尝不喜《孟子》，然朱子《读尊孟辨》引觏有“孟子五霸之罪人”语，今集内无之，然则陈振孙所见之《常语》盖多于今本，不知今本为人删削邪，抑宋世所行或反有非其真者邪？觏之文章盖次于欧、曾、苏、王，其论治体颇可见于实用，兹尤可贵也。其《平土书》、《明堂》、《五宗》皆别有图，图今不传，惟其序说存于此。⑦

比较《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与姚鼐的《李盱江集》提要，可见重大不同。《浙江采集遗书总

---

① 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张晓梅译，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312 页。
② 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 2、4、411 页。
③ 歌德致拉瓦特尔，1780 年，转引自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09 年，扉页。
④ 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第 2 页。
⑤ 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以下简称《初呈书目》。
⑥ 沈初等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558 页。
⑦ 吴格等标校：《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 425-436 页。

录》重点谈的是李觏“其实如秋，其受如海”的传授弟子之功，但姚鼐的提要无一字采用，可以推测，姚鼐的分纂稿或是不满意底本，另起炉灶，或是所用底本并非浙江采集遗书提要。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书目》基本沿袭姚鼐提要稿，但有几处相异。其一，把《李盱江集》改为《盱江集》。其二，姚鼐在分纂稿中提出疑问：“不知今本为人删削邪，抑宋世所行或反有非其真者邪？”《初呈书目》予以考证，明确指出“此集为明南城左赞所编”，“盖非当日之旧”。其三，将姚鼐稿中“陈振孙云：‘泰伯不喜《孟子》’”的论断，改成“宋人多称觏不喜孟子”。其四，在姚鼐的稿本基础上进一步质疑《盱江集》所辑文章，指出“余允文《尊孟辨》中载觏《常语》十七条。而此集所载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及《伊尹废太甲》、《周公封鲁》三条，盖（左）赞讳而删之。集首载祖无择《退居类稿序》，特以孟子比觏。又集中《答李觏书》云：‘孟氏、荀、杨醇疵之说，不可复轻重。’其他文中亦颇引及《孟子》，与宋人所记种种相反。以所删《常语》推之，毋亦赞所窜乱欤？”更强调“朱子谓觏文实有得于经。其不喜《孟子》，特偶然偏见，与欧阳修不喜《系辞》同，可以置而不论。赞必欲委曲弥缝，务灭其迹，所见陋矣”。其五，姚鼐稿中称许李觏“论治体颇可见于实用，兹尤可贵也”。《初呈书目》删去“兹尤可贵也”一语，降了半调。其六，加了一段关于李觏诗作的评价，谓：“觏在宋代不以诗名，然王士祯《居易录》尝称其《王方平》《璧月》《梁帝》《送僧游庐山》《忆钱塘江》五绝句，以为风致似义山。今观诸诗，惟《梁帝》一首不免伧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广平之赋《梅花》矣。”① 和姚鼐稿比较，《初呈书目》关于李觏的论述更全面，对左赞在编纂《盱江集》时的“窜乱”与“讳而删之”揭示得更充分，对李觏“不喜孟子”的评价也更为宽容。

文渊阁本“恭校上”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其提要大部分沿袭《初呈书目》文字。但进一步比较，文渊阁本的《盱江集》提要和《初呈书目》本的提要有三个差异。

第一，《初呈书目》中“集中《平土书》《明堂》《五宗》皆别有图，此本不载，则或久佚不传”一句系承袭姚鼎文提要，但文渊阁书前提要多了“未必赞所刊除也”的判断。

第二，《初呈书目》评价李觏诗作风格“亦可谓广平之赋《梅花》矣”。在文渊阁书前提要中改成了“余皆不愧所称渊明之赋闲情矣”。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不同，《初呈书目》以“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广平之赋《梅花》矣”一句收尾，而文渊阁书前提要本则多了一段文字：“《湘山野录》载觏望海亭席上作一首，集中不载。考是时蔡襄守福唐，于此亭邀觏与陈烈饮。烈闻官妓唱歌，才一发声，即越墙攀树遁去。讲学家以为美谈。觏所谓‘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拍板便惊飞’者正以嘲烈，殆亦左赞病其轻薄，讳而删之欤。”②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前，其《盱江集》提要曰：“朱子论觏文，实有得于经。其不喜《孟子》犹欧阳修不信《系辞》，意见偶偏，儒者之所恒有。明左赞重刻此集，乃删其疑孟子之词，并点窜其文，使改而尊孟，殊为庸妄。然今不得其原本，姑仍赞本录之，而附订其谬焉。”③ 系对《初呈书目》评说的精炼概括，并阐述对左赞之本的评价和“仍赞本录之”的原因。

文溯阁本“恭校上”于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其《盱江集》提要文字同于《初呈书目》。

文津阁本“恭校上”于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其文字同于《进呈书目》与文溯阁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本同于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

对于这些文本上的差异，一般四库提要比较者往往归于四库馆臣的修改。问题在于，《初

① 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书目》，第 376 页。

② 《盱江集》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 153，第 1095 册，第 1–2 页。

③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第 618 页。

呈书目》[①]后，在“恭校上”的时间线上，文渊阁书前提要成稿最早（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其次是文溯阁书前提要（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文津阁书前提要（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四库全书总目》（乾隆六十年前），[②]如果说，阁本提要皆以《初呈书目》为修改基础，那么，为什么“恭校上”时间在前的文渊阁本对《初呈书目》本有修改，而“恭校上”时间在后的文溯阁本和文津阁本皆沿袭《初呈书目》不改，而定稿在最后的《四库全书总目》又是承袭文渊阁书前提要而来？赵喜娟曾不无疑虑地提出：“按照提要落款时间看，文溯阁与文津阁提要在后，文渊阁在前，但抄成时间在前的文渊阁本比后抄成的文溯阁本、文津阁本还详细，难道文溯阁本与文津阁本在抄写中自行删减？若是书手任意删减，为何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大部分删节的恰如其分，不留痕迹？除非文津阁本与文溯阁本不是据文渊阁本抄录，如果此结论得到肯定，其他几阁据文渊阁抄成之说将受到质疑。”[③]而“两个文本系统说”正可回答她的疑问。

（二）《盱江集》文渊阁书前提要稿的思想史指向

文渊阁本与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最大的区别，是文末加上的李觏讥嘲陈烈一事。陈烈，与陈襄、周希孟、郑穆为友，称“海滨四先生”。《宋史》有传：“陈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笃于孝友。居亲丧，勺饮不入于口五日，自壮及老，奉事如生。学行端饬，动遵古礼，平居终日不言，御童仆如对宾客。里中人敬之，冠昏丧祭，请而后行。从学者常数百。贤父兄训子弟必举烈言行以示之。”文渊阁本所叙之事见于《道山清话》：“泰伯一日与处士陈烈同赴蔡君谟饭，时正春时，营妓皆在后圃卖酒，相与至筵前声喏，君谟留以佐酒，烈已不乐。酒行众妓方歌，烈并酒掷于案上，作皇惧之状，逾墙攀木而遁。时泰伯坐上赋诗云：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对落晖。谁在画楼酤酒处，几多呜橹送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积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既而，烈闻之，遂投牒云：李觏本无士行，辄篮宾筵，诋释氏为妖胡，指孟轲为非圣。按吾圣经云，非圣人者无法，合依名教，肆诛市朝。”[④]这段轶事，左赞在编纂《盱江集》时，“病其轻薄，讳而删之”，文渊阁系统本却特意补加，其意并非借此贬抑李觏，而是一方面呈现李觏不拘礼法的性格，另一方面嘲讽陈烈的迂阔。如果比照《澹庵文集》提要，这个嘲讽意味就看得更清楚。

《澹庵文集》是南宋胡铨文集。胡铨，南宋名臣。绍兴八年（1138），宰相秦桧决策主和，金使南下诏谕江南，中外汹汹。胡铨“抗疏诋和议”，请将秦桧及其党羽王伦、孙近斩首并“竿之藁街”，被贬斥岭南。直到孝宗即位，胡铨才又被起用。北归途中，胡铨饮于湘潭胡氏园，微醺中题诗于壁上：“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所谓“梨颊生微涡”者，“谓侍妓黎倩也”[⑤]据朝鲜宋子烈《朱子大全·随疑》，胡铨在“饮梅溪胡氏园时”，“尝通侍妓黎倩而作诗，为其夫所执，赐莝豆马食之，否者杀之。澹庵遂食之”。[⑥]

胡铨恋黎倩一事，成为后世不断议论的话题。反应最为强烈的是朱熹。乾道三年（1167），朱熹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后，归途中宿湘潭胡氏园，见到壁间胡铨题诗，不禁生出“人心惟危”的感叹，遂作《宿梅溪胡氏客馆观壁间题诗自警二绝》，其词曰：“贪生莝豆不知羞，靦面重来蹑俊游。莫向清流浣衣袂，恐君衣袂涴清流。”“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路

---

① 关于《初呈书目》汇稿的时间，四库学界意见不统一，夏长朴认为，《初呈书目》的汇稿时间应在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刘浦江认为，《初目》的汇编成稿时间应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

②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盱江集》提要虽大意和其他提要相通，但文字简略，此处不列入比较之列。

③ 赵喜娟：《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考校——以集部别集类（汉魏至宋代中期）为例》，第83页。

④ 《道山清话及其他一种》，《丛书集成初编》（补印本），1939年，第26页。

⑤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58，《澹庵文集》提要，第1360页。

⑥ 宋时烈：《朱子大全·随疑》卷1《赋诗》，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16册，景仁文化社，1993年，第270页。按，此则材料原转引自日本学者佐藤仁《关于朱熹“敬”说的一个考察》，近蒙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赐以原始文本，至为感谢。

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①

在朱熹的观念中，人欲是一个令人坠坑落堑的很可怕的东西。胡铨情迷黎倩一事，再次印证了他的论断。因此，他不仅对胡铨“贪生莖豆不知羞”之举表示鄙夷之情，而且借机再次突出人欲的“险恶”性：一旦陷入“人欲”的陷阱，无论曾经是如何铮铮铁骨，其下场只能是“自误平生”。因此，他的结论是人必须始终保持“危惕”意识，以居敬的工夫去人欲，存天理，“虎尾春冰寄此生”。②

朱熹对胡铨恋黎倩的评价影响深远。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十二《自警诗》中说：“尤物移人，虽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无如人欲险，信哉。”③ 朝鲜朱子学大家李滉（退溪，1501—1570）也议论道：“人欲之险，乃有以拄天地、贯日月之气节，一朝摧销陷没于一妖物颊上之微涡，取辱至此，为天下诟笑如胡公者。其可畏如此。”④

然而，对于胡铨迷恋黎倩一事以及朱熹等人的严厉批评，袁枚却持尖锐对立的立场。他在多篇文字中声援胡铨，斥责朱熹。在他看来，胡铨的“请斩秦桧”和“拳拳于黎倩”，苏武的“啮雪吞毡”和“取胡妇”，都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胡铨恋黎倩，不仅不能构成非议他的理由，而恰恰表明了胡铨有真性情。正是因为有这种真性情，胡铨为国家，不畏诛，不畏贬；为黎倩，不畏人訾议。朱子对胡铨的责难，不过是“腐儒矜然安坐而捉搦之”，“甚无谓也”。⑤

文渊阁本与《四库全书总目》本的提要，呼应袁枚之说，也对朱子的斥责发出不同意见：“铨孤忠劲节，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陈烈逾墙之遁，遂坐以自误平生，其操之为已蹙矣。平心而论，是固不足以为铨病也。”⑥ 在提要中，“胡铨恋黎倩”一事被淡化为“偶遇歌筵”，其回护之意跃然纸上。更重要的是，提要指出，不能以“陈烈逾墙之遁”作为道德标准，指责胡铨“坐以自误平生”，这样的说法“操之为已蹙矣”，其锋芒直指朱熹对胡铨的道德谴责。据《宋史·陈烈传》载，司马光“每患士无名检”时，“举烈以厉风俗”。⑦ 文渊阁文本系统的提要却持完全相反的立场，将陈烈作为“存理灭欲”的嘲讽对象，从而与《盱江集》提要形成呼应，此中深意不可忽视。

四、《文章正宗》提要的比较分析

《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真德秀编。目前可见翁方纲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及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总目》六种文本。

翁方纲纂《文章正宗》提要稿曰：“德秀以后世文辞多变，欲学者识其正，故此书专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门。盖编于理宗绍定五年壬辰之岁，是时学者皆知恪守程朱绪言，而是编之出，因文阐理，信经训之菑畲矣。前代刻本不一，或有变

---

① 朱熹：《宿梅溪胡氏客馆观壁间题诗自警二绝》，《朱熹集 》第 1 册，郭齐、尹波点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214 页。

② 朱熹：《择之所和生字韵语极警切次韵谢之兼呈伯崇》，《朱熹集 》第 1 册，第 214 页“关于胡铨、黎倩”一事，笔者曾于拙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首揭，之特此说明。

③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 12，刘友智校注，齐鲁书社，2017 年，第 407 页。

④ 李滉：《退溪先生文集》卷 16，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 29 册，景仁文化社，1898 年，第 425 页。

⑤ 详见袁枚：《读胡忠简公传》，《小仓山房续文集》卷 30；《牍外余言》卷 1；《小仓山房尺牍》卷 7；《随园诗话》卷 3。《袁枚全集新编》第 7 册第 608 页，第 15 册第 24、157、91−92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

⑥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 158《澹庵文集》提要，第 1360 页。《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下册，第 658 页）也评价：“铨大节凛然，乃以歌筵一咏，斥为尽丧生平，操之未免蹙矣。”与文渊本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一脉相承。

⑦《宋史》卷 217《陈烈列传》。

其体例、各归某家为卷者，颇失编录之旨。今应仍照原本重校刊之。”[①]

文渊阁本《文章正宗》提要校定于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其文字与翁之分纂稿比较，几乎面目全非。其文本在介绍《文章正宗》版本情况后评曰：

> 其持论甚严，大意主于论理而不论文，刘克庄集有《赠郑宁文》诗曰：昔侍西山讲读时，颇于函丈得精微。书如逐客犹遭黜，辞取横汾亦恐非。筝笛焉能谐雅乐，绮罗原未识深衣。嗟予老矣君方少，好向师门溯指归。其宗旨具于是矣。然克庄《后村诗话》又曰：《文章正宗》初萌芽，以诗歌一门属予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如仙释闺情宫苑之类皆勿取。余取汉武帝《秋风词》，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词为悔心之萌，岂其然乎？意不欲收，其严如此。……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诗甚多，如三谢之类多不收，详其词意，又若有所不满于德秀者。盖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各明一义，固不可得而强同也。顾炎武《日知录》亦曰：“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刊落，必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毋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所论至为平允，深中其失。故德秀虽号名儒，其说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欤？然专执其法以论文，固矫枉以过正，兼存其理以救浮华冶荡之弊，则亦未尝无裨。藏弆之家，至今著录，厥亦有由矣。[②]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文章正宗》提要曰：

> 所录皆唐以前文，分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类。续集则宋代之文，仅有议论、叙事二类，犹未成之稿也。大旨以言理为主，故其去取与古来论文者迥异。其说虽不可行，而持论甚正，亦无词以废之。故自宋以来无人诵习，而插架则不能不备焉。[③]

文溯阁本《文章正宗》校定于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其提要文字前半部同于文渊阁本《文章正宗》提要，但至“盖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各明一义，固不可得而强同也”一句戛然而止。[④]

文津阁本《文章正宗》提要校定于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提要除将文溯阁提要中“好向师门识指挥”一句改成“好向师门识指归”外，其余文字相同。[⑤]

《四库全书总目》本《文章正宗》提要完全同于文渊阁本。

比较《文章正宗》各提要，诸阁本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本提要的文字，几乎都脱开了翁方纲分纂稿另行撰写。而文渊阁本和《四库全书总目》本，则在“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各明一义，固不可得而强同也”后，比文溯阁、文津阁本多出了一大段文字。《简明目录》本提要中的文字，则明显是从文渊阁本提要脱胎而来，试一比较《简明目录》中“其说虽不可行，而持论甚正，亦无词以废之。故自宋以来无人诵习，而插架则不能不备焉”一语，与文渊阁本提要中“德秀虽号名儒，其说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以及“藏弆之家，至今著录，厥亦有由矣”，口气何其相似。

从文字来看，文渊阁本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本似是从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加工而来，但是，文渊阁本提要校定于乾隆四十二年，而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校定的时间分别是乾隆四十七年与乾隆四十九年。如果说后继的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提要是对文渊阁本提要加以删节，似无道理，因为乾隆六十年前刊印的《四库全书总目》与文渊阁本提要却是一致。

但笔者认为，在翁方纲分纂稿后或还有一个稿本，其后，文溯阁本和文津阁本基本就沿袭

---

① 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071 页。

②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55 册，第 2 页。

③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第 840 页。

④ 金毓黼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第 5 册，第 3766 页。

⑤ 《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下），第 1267–1268 页。

了这一稿本，而文渊阁本和《四库全书总目》本则在该稿本的基础上做了重要修改。

比较《文章正宗》的不同提要，其思想上的差异显然可见。

真德秀编纂《文章正宗》，其宗旨乃是以理学文艺观来规范文学道路。他在《文章正宗·纲目》中说："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繇今视之二书，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①

翁方纲学宗程朱，注重义理，其分纂稿与《文章正宗》多有思想共鸣，故袭用真德秀自述："此书专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更称"是编之出，因文阐理，信经训之菑畲矣"。

对于翁方纲的分纂稿提要，各阁本提要基本没有采纳，而是推倒重来。其一致评价是：此书"持论甚严，大旨主于论理而不论文"。这个评价与翁方纲的"因文阐理"之说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了佐证这一评价，提要引述刘克庄的《赠郑宁文》诗与《后村诗话》，以体现偏重情感和文采的刘克庄和坚持理学正统价值观的真德秀在诗学观念上的分歧，虽然，提要的立场和感情偏向于刘克庄的诗学主张，但仍以"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各明一义，固不可得而强同也"一语，表明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至"固不可得而强同也"一句为止，诸阁本提要文字大皆相同，但文溯阁本和文津阁本以此句结束，文渊阁本和《四库全书总目》本却在"固不可得而强同也"后加上一大段评论。在这些文字中，提要转述顾炎武《日知录》关于《文章正宗》的论说，其要害是批评《文章正宗》"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执理太过，"必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并肯定顾炎武之说："所论至为平允，深中其失"，大大加强了对真德秀理学文学观的批判。接踵而来，提要更尖锐地指出："德秀虽号名儒，其说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这是在用"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的历史实践来否定其说"卓然成理"的合理性，凸显这种学说的苍白和缺乏生命力。提要进而上升到一种普遍性理论："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欤？"这个反诘，已经跳出了汉宋之争的范畴，传递出一种同情人情、理解人情并以人情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的社会文化观念。当然，提要最后亦未对《文章正宗》全盘否定，而是称："然专执其法以论文，固矫枉以过正，兼存其理以救浮华冶荡之弊，则亦未尝无裨。藏弆之家，至今著录，厥亦有由矣。"但这个肯定已经很有限了。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文字虽简易，但立场与话语却与文渊阁本提要一脉相通，所谓"其说虽不可行，而持论甚正，亦无词以废之。故自宋以来无人诵习，而插架则不能不备焉"。其贬斥之意跃然字间。

五、《古今纪要》提要的比较

《古今纪要》，十九卷，宋黄震撰。其提要目前可见《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以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等七种。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的《古今纪要》提要十分简单，其词曰："《古今纪要》十九卷。石宋宗正少卿慈溪黄震撰。摘录各史姓名事实之要，以为查检之本。明正德间书林龚氏与《日抄》

① 真德秀：《文章正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第5页。

同刊者。”[①] 这一提要未为后来阁本提要采用。

文渊阁本“恭校上”于乾隆四十四年九月。该提要评述说：“是书撮举诸史，括其纲要，上自三皇，下迄哲宗元符。每载一帝之事则以一帝之臣附之，其僭窃割据亦随时附见。词约事该，颇有条贯，非曾先之《十八史略》之类粗具梗概、伤于疏陋者比。所叙前代诸臣各分品目，惟北宋诸臣事迹较历代稍详，而无忠佞标题，盖不敢论定之意也。朱子作《通鉴纲目》始遵习凿齿《汉晋春秋》之例，黜魏帝蜀。同时张栻作《经史纪年》，萧常作《续后汉书》，持论并同。震传朱子之学，故是书亦用纲目之例。其谓论昭烈者每以族属疏远为疑，使昭烈果非汉子孙，曹操盖世奸豪，岂不能声其罪而诛其伪，今反去之千百载下而创疑其谱牒耶？其所发明，可谓简而尽矣。”[②]

文溯阁本提要校定于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其文本与文渊阁本比较，可见多处不一致。文渊阁本的“词约事该，颇有条贯，非曾先之《十八史略》之类粗具梗概、伤于疏陋者比”一句，在文溯阁本中是“采摭正史，提挈要领，词简约而事博该，殆亦岳珂《读史备忘》之类”；文渊阁本的“所叙前代诸臣各分品目，惟北宋诸臣事迹较历代稍详”一句，在文溯阁本中是“所叙北宋诸臣事迹较历代稍详”；文渊阁本的“朱子作《通鉴纲目》始遵习凿齿《汉晋春秋》之例，黜魏帝蜀。同时张栻作《经世纪年》，萧常作《续后汉书》，持论并同”一句，在文溯阁本中是“北宋代周颇类于曹氏之代汉，故靖康以前名儒辈出，拘于时忌，无一人敢黜魏进蜀者，虽司马光作《通鉴》亦不得不仍陈寿之说。及南宋偏安，与蜀相类，朱子《纲目》始改旧文”。文渊阁本中的“震传朱子之学，故是书亦用纲目之例”，在文溯阁中是“震传朱子之学，发明尤尽”。[③]

文津阁本提要校定于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其文字同于文溯阁提要。[④]

纪晓岚删定稿本改动有两处，一处是错字更正。另一处是将原稿最后一句“其所发明，可谓简而尽矣”改为“一语决疑，可谓简而尽矣”。[⑤]纪晓岚的这一改动，不见于各阁本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

《古今纪要》各文本提要的比较再次呈现了文溯阁提要系统与文渊阁提要系统的不同面貌。虽然文溯阁本与文津阁本提要“恭校上”的时间要晚于文渊阁本，但多了一段文字，即“北宋代周颇类于曹氏代汉，故靖康以前名儒辈出，拘于时忌，无一人敢黜魏进蜀者，虽司马光作《通鉴》亦不得不仍陈寿之说”。可见与文渊阁本是平行的另一系统文本，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更多地脱胎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总目》则与文渊阁本同。四库提要中的《今古纪要》由此形成如下两个文本系统。

未知稿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本—《四库全书总目》本

未知稿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

比较文溯阁文本系统与文渊阁文本系统，前者对《古今纪要》有更多的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多了一段对北宋诸儒尊魏黜蜀的原因剖析。在《三国志》提要中，文溯阁本系统将陈寿尊魏黜蜀归因于识见不如习凿齿，在《古今纪要》提要中，则强调“北宋代周颇类于曹氏之代汉”，“拘于时忌，无一人敢黜魏进蜀者”。换言之，无论是“黜魏进蜀”还是“进魏黜蜀”，都不是由个人识见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其身处的政治格局。这一分析，颇近于文渊阁文本系统关于三国正统观评价应当“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的论断。可见，即使在同一文本系统内，提要

---

① 沈初等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上册，第 298 页。

② 《古今纪要》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84 册，第 1 页。

③ 金毓黼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第 2 册，第 269 页。

④ 《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上)，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18 页。

⑤ 《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 3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年，第 610 页。比较蹊跷的是纪晓岚删定稿本的地位。众所周知，纪晓岚是《四库全书总目》的把关者、“笔削一贯”者，他的修改为什么没有被《四库全书总目》采纳，他在原稿本上删掉的“其所发明”四个字，仍见于文渊阁本和《四库全书总目》，他加上的“一语决疑”四字不见于各文本，是誊录生的失误还是其他原因，尚须进一步考察。

撰写者也会因史观不同，对史事做出不同评论。

六、结语

本文攫取四库文本系统中的《三国志》提要、《旴江集》提要、《文章正宗》提要、《古今纪要》提要进行多版本的比较，结论如下：

第一,四库提要的编纂过程极为复杂。“提要文本的差异既可以由不同时期的修改造成，不同文本系统的存在也是产生不同提要文本的重要原因。”① 许绍杰与笔者关于《小字录》《孝经大义》《孝经注疏》《周易旁注前图》《革除遗事》《三国志》《旴江集》《文章正宗》《古今纪要》等提要的文本比较正展现了提要的修改或是基于不同源文本。正是从不同源文本出发，形成文渊阁提要文本系统与文溯阁提要系统不同的书写面貌。但这一结论不可推之于所有提要。据王娟研究，文渊阁本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也存在诸多差异。她指出，文渊阁“易类”书前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易类”提要“完全一致”者仅有 10 种，“略有差异”者达 102 种，“较大差异”者有 47 种，“完全不同”者有 7 种。② 由此提示四库提要的比较研究，要从表面的局部的文本比较，转入整体性的流变比较、脉络比较，非此不能对“提要文本差异”作出逼近提要编纂复杂过程的诠释。

第二,《三国志》《旴江集》《文章正宗》三书分属史部、集部，其间并无关联，但笔者通过多版本提要的流变比较，发现文渊阁文本系统中的这些提要在思想观念上有一条一脉贯穿的联系。这就是钱穆所指出的：“清儒到底也有耐不住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的不自觉而对人生问题有所论列，则他们亦有一共同态度与共同意见。他们大抵反对抬出一个说法来衡量一切或制裁一切。换言之，他们反对思想上的专尊，或说人生理论上之独断。他们大抵主张解放，同情被压迫者。他们的气味，宁是反经学的，至少是非经学的，所以说，经学不是清儒自己要走的路。”“他们只是卑之毋甚高论，求平恕，求解放，此乃乾嘉诸儒之一般意见，而非东原个人的哲学理论也。”③《三国志》提要中对三国正统论者设身处地的同情与理解,《旴江集》提要中对陈烈逾墙之遁的嘲讽,《文章正宗》提要中“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的呼吁，都贯穿了这样一条思想脉络，从而和文溯阁提要文本系统的思想指向形成对比。

《四库全书》是一部“钦定”的丛书，整个编纂工作都在乾隆帝的监管下进行。诚如《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所言：“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④ 因此，从四库提要到《四库全书总目》代表的是官方意志，是乾隆时期文化霸权的重要部分，可谓毋容置疑。由此，文渊阁本系统中体现的“求平恕”和反抗理学专制的思想似乎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使命形成一种悖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似可从“应然”与“实然”两种研究方法入手。

所谓“应然”就是应该如此，用英文表达是 should。所谓“实然”就是实际如此，用英文表达是 is。在“应然”的视野下,《四库全书总目》应该在毛细血管中贯穿乾隆帝的意旨，处处呈现乾隆帝所要求的“学术忠诚”。这种“应然”由于“符合了某个时代大家的共识，所以大家都接受它并承认这种真实，于是它就成了‘真实’。大家承认的共识，就是一种‘权力’”。⑤ 在“实

---

① 许超杰:《〈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文献》2020 年第 6 期。

② 王娟:《〈四库全书总目〉与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比勘研究——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为基础》，山东大学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64 页。

③ 钱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国学术思想论丛》(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4、8 页。

④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一》，第 16 页。

⑤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 89 页。

然”的视野下，四库提要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乾隆之心则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前提，而不能以“应然”代替“实然”。诚然，在《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中，乾隆帝“用权术、权力或暴力剥夺思想者的思考”，[①] 以致“四库馆”虽然聚集了当时的一流学者，却不能有独立的思考，发表独立的意见，只能是自承“睿鉴高深，迥非诸臣管蠡之所及”，“随时训示，旷若发蒙”。[②] 但是压抑从来不是万能的。如上四库提要的比较恰恰让我们看到以帝王的意志统一天下思想只能是包括乾隆帝在内的历代专制君主的一厢情愿。即使乾隆帝亲自监管的四库馆，以及他直接指导和干预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都无法达到思想一致、“学术忠诚”的结果。何宗美、张晓芝所著《〈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指出：乾隆帝称：“有明制义诸体皆备，如王、唐、归、胡、金、陈、章、黄诸大家卓然可传。”[③] 但对这些乾隆帝称赞的“卓然可传”的明代制义大家，四库馆臣并没有全都编录其书，有的甚至连存目都未列入。[④] 黄琼谊在《纪昀综论》中专有一节论“《四库全书总目》异于乾隆的学术意见”，揭示《四库全书总目》“并不以乾隆好恶为品评之准则”。[⑤] 作者指出：“《四库全书总目》的撰写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要体会、揣摩、贯彻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趣味，过度地夸大《四库全书总目》的‘钦定性’，《四库全书总目》的撰写者也并非只是代笔人而已”。[⑥] 杨晋龙在研究中指出：尽管乾隆帝对钱谦益深恶痛绝，多次斥其“不足齿于人类”，“不足比于人类”，下令尽数销毁钱谦益的著作，甚至《贰臣传》也要削去其名，但是，《四库全书》总共有 36 部书（的提要）正面肯定钱谦益或其著作，占《四库全书》出现钱谦益信息总数 84 部书的 42. 86%，为直接发言批判 16 部书的 2. 25 倍，显然与乾隆帝原先只准存留“诋訾”钱谦益信息的命令与期望不相符合。作者认为：这些与乾隆帝意旨不合的情况不能简单归之于编纂者的疏忽与不负责任，“钱谦益在文学创作与评论、史实考证及艺术鉴赏等方面的成就，使得馆臣处身在这些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之前，很难甚至不可能‘心安’地遵循乾隆帝‘谕旨’，因而彻底消灭钱谦益的相关讯息，进而全面攻讦钱谦益，这种站在历史事件之前，自我要求真实呈现史实的基本心理，应该是导致《四库全书》的编辑官员，无论是刻意或是疏忽，无法彻底执行乾隆帝毁灭钱谦益‘人格’与‘学术’意志的另一项内在原因。”[⑦] 这些研究均对笔者所论形成支撑。笔者还注意到，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在上谕中指斥：“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恭校上”于上谕一个多月后的文渊阁本《三国志》提要就为陈寿的“于蜀汉有嫌”作出辩护。这一反差不能不令笔者惊讶。姚莹曾指责纪昀“以四库总裁之权，愚欺天下之人”时，称“圣主万几，徒以其博而用之，岂能一一驳正乎？”[⑧] 无意中道出了“以一人治天下”的君主思想专制必然存在的隙缝。由此可见皇权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虽然自我压制、自我禁抑，在皇权专制的毛细血管作用下被皇权思想所整合，但是，士人固有的知识理性并无法彻底消泯。它们犹如生命力执拗的小草，只要有空间，就会挣扎生长，使阴沉压抑的思想天地呈现出不一样的色调。当然，四库提要形成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文溯阁提要系统在《三国志》提要中斥责陈寿尊魏黜蜀是因为其识不如习凿齿，在《古今纪要》提要中则指出陈寿、司马光的尊魏黜蜀是因为“拘于时忌”。文渊阁提要系统中其他提要的思想观念也一定会互相冲突，既有体现钱穆所揭示的清儒的思想与共同意见，也有“仰秉天裁”，贯彻清代君主专制主义意旨的评论，而这一切需要更为详密和全面的研究。历史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努力发掘制度文

---

① 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的思想史论证》，《中国思想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第 454 页。

②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一》，第 16 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1 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年，第 82 页。

④ 何宗美、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4 页。

⑤ 黄琼谊：《纪昀综论》，文史哲出版社，2011 年，第 24−51 页。

⑥ 黄琼谊：《纪昀综论》，第 490 页。

⑦ 杨晋龙：《不应存在的存在：《〈四库全书〉的钱谦益身影考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70 期，2020 年。

⑧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 3 册，黄山书社，2010 年，第 78 页。

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而不能满足于既定的概念与逻辑的推断。赫尔德告诫说："我和你知道得一样清楚，所谓的全景图，任何一种概而括之的概念，都不过是抽象罢了。"① 是为历史研究方法论之重要提示。

第三，"两个文本系统，两种思想指向"虽然是本文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未可推之于其他提要。许绍杰研究的《孝经大义》《孝经注疏》《周易旁注前图》《革除遗事》等提要，虽然也存在不同文本系统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在思想指向上并无显然的不同。只有展开更大规模的比较研究，并将文献考察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方能得出更全面的结论。

References

Ge Zhaoguang. *Sixiangshi yanjiu ketang jianglu zengdingban chubian shiye jiaodu yu fangfa*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2019.

Liu Pujiang. "Sikutiyao yuanliu guankui : yi chensi xiaozilu weili" (The source of the sikutiyao − taking Chen Si's "Small Character Record" as an example). *Wenxian* (The Documentation) 5 (2014).

Xu Chaojie. "Sikuquanshu tiyao wenben xitong gaishuo" (*Siku quanshu* synopsis text system examples). *Wenxian* (The Documentation) 6 (2020).

Zhao Xijuan. "Wenyuange wenjinge sikuquanshu tiyao kaojiao: yi jibu biejilei hanwei zhi songdai zhongqi weili" (Wenyuan Pavilion and Wenjin Pavilion sikuquanshu Summary Examination School: Taking the Collection of Departments and Categories (Han and Wei Dynasties to the Middle So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M. A. thesis. Nanjing: Nanjing shifan daxue, 2013.

Zhou Jiming. "Cong daode piping dao lishi renshi: songzhiqing guanyu sanguo zhengtong shuxiezhe de pinglun zhuanxiang" (From moral criticism to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centered on the shift of comments on the orthodox writers of the Three Kingdoms' History from Song and Ming to Qing). *Shixue yueka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10 (2023).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views of Four Books, Including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ZHOU Jim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Hubei University; 1405304691@qq. com)

Abstract: There are numer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raft, cabinet, and final versions of the Siku Summary. The mainstream view is that these differences primarily arise from the processes of replacement, supplementation, and re−examination involv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 Consequently, the Siku Summary underwent repeated modification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unauthorized alterations by officials, omissions and oversights by copyists, and Ji Xiaolan's consistent editing. However, beyond these factors, it is likely that the cabinet and final versions of the Siku Summary were revised based on different source texts. Starting from different source texts, the summaries for four works—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 "Xijiang Collection, " "Orthodox Literature, " and"Comprehensive Chronicl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form two distinct textual systems. One system is primarily represented by the Wenyuan Pavilion summary and the"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 while the other is 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Wensu Pavilion summary and the Wenjin Pavilion summary. These two textual systems not only differ in wording but also exhibit certain differences in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Keywords: Siku Summary, textual systems,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① 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 2、4 页。